

收缩型区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机制研究

严运楼, 王敏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硬道理”。我国部分区域面临人口流失、产业收缩难题,传统外延式发展模式陷入瓶颈,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迫在眉睫。精明收缩理论与内生发展理论提供了涵盖人力资本、制度资本、产业资本、社会资本的四维内生动力分析框架。针对创新动能断层、产业结构单一、治理协同失灵、集体行动乏力等问题,收缩型区域必须构建人才振兴机制、产业韧性机制、治理调适机制、网络再造机制,积极探索突破封闭循环、融入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收缩型区域; 高质量发展; 精明收缩; 内生动力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6)01-0064-09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51215716

Research on the Endogenous Dynamic Mechanism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Shrinking Regions

YAN Yunlou, WANG Minjiao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00, China)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stated tha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new era”. As some regions in China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loss, industrial shrinkage, and the bottleneck of the traditional extensive development model,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pathways for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smart shrinkage and that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rovide a four-dimensional endogenous dynamic analysis framework, covering human, institutional, industrial and social capitals. To solv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momentum, a single industrial structure, poor governance coordination and weak collective action, shrinking regions must establish mechanisms for talent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adjustment and network reconstruction, and actively explore effective pathways to break through the closed cycle and integrate into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shrinking regio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ory of smart shrinkage; endogenous dynamics

收稿日期: 2025-12-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KS059)

第一作者: 严运楼, 男, 教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与治理现代化研究。E-mail: yanyunlou@126.com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硬道理”,“十五五”规划积极响应这一根本指引,并作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1]。然而,我国部分区域正呈现人口流失与产业收缩的特征,这对传统依赖要素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模式构成现实挑战,凸显探索收缩型区域高质量发展路径的紧迫性。实现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是此类区域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基的重要命题。

“精明收缩”理论主张以主动、战略性减量规划优化空间与资源配置,提升系统运行效能,为理性应对收缩提供价值导向。内生发展理论强调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立足于对本地人力、制度、产业与社会资本的系统激活与培育。二者有机结合形成高质量发展逻辑,在战略收缩中强化内生动力,在区域协同中拓宽发展空间,为收缩型区域践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硬道理”的深刻内涵高度统一,指明收缩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结构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根本在于增进人民福祉,路径在于构建既扎根本地又开放协同的内生动力系统。

本研究在理论上深化对“收缩、适应、再生”动态过程及规律的认识,丰富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论的内涵,强调内生动力必须在区域联动中才得以真正激活与持续。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为收缩型区域突破封闭循环、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提供类型化路径参考,助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共同迈向更平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筑牢区域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收缩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精明收缩”与内生发展的理论融合

“精明收缩”理念由 Popper 等学者在应对美国“锈带”城市衰退时提出,核心理念是主张通过战略性的“做减法”,即减少人口、建筑和土地利用的规划负担,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提升

存续空间的质量与居民福祉,实现城市的再生与可持续发展^[2]。“精明收缩”为审视收缩现象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导向:收缩并非失败的标志,而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可能状态,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精明战略将“剩余”空间转化为机遇,在更广阔的区域协同网络中重新定位自身功能。内生发展理论强调区域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内部要素的活化与协同,并非排斥外部联系;真正有韧性的发展必须根植于本地“人力资本、制度资本、产业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同时以开放姿态融入区域分工体系,通过激发本地创新活力、培育特色产业、完善治理结构,实现区域在内外互动中的自我持续发展。

二者的理论融合,为理解收缩型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系统性分析框架。第一,“精明收缩”为内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战略指引与理性空间。它要求区域发展必须直面人口与资源减少的现实,抵制不切实际的规模扩张,同时也要避免自我封闭,主动在区域协同中寻求功能互补与资源交换,避免在错误方向上的资源投入。第二,内生发展为“精明收缩”提供了根本路径与动力源泉。若仅有收缩无内部动力的支撑,区域易滑向衰退;以内生资本为核心、以外部协同为支撑的发展,才能确保收缩过程成为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的“精明”过程。“精明收缩”与内生发展理论的融合,本质上是“战略引领”“路径承载”与“系统开放”的统一,构建了一种适用于收缩型区域的新发展逻辑,即以“精明收缩”的思维优化规模与结构,以“内生发展”的策略激活内部资本,以“区域协同”的视野链接外部资源,共同导向更具韧性、更富效能、更贴近民生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与价值逻辑

收缩型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并非传统发展模式在规模上的简单收缩或速度上的被动放缓,而是一场涉及发展逻辑、空间组织与治理方式的系统性变革。核心要义体现为“要素高效配置、民生持续改善、生态价值转化”三大支柱,三者相互依存、彼此强化,构建起区别于单一 GDP 增速导向的新型发展内涵。

第一,结构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收缩型区域,要求超越被动适应衰退的思维,

主动推动经济与社会空间的双重重组。在产业层面,着眼区域协同分工,引导资源从低效部门向具有区域比较优势与网络嵌入潜力的环节转移,推动产业体系从单一化、高刚性向专业化、高韧性与区域协作化演进。在空间层面,从粗放蔓延的“摊大饼”模式,转向集约紧凑的“组团化、网络化”模式,注重与区域基础设施网络、生态格局的衔接,以适应人口变动、降低运营成本,并增强在区域空间结构中的联结性与功能价值^[3]。

第二,效率提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当外延式扩张受限,内涵式效率提升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效率包括资本、土地等要素的配置效率,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力源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与制度创新。对于收缩型区域,提升效率就必须将有限的资本和宝贵的人才“好钢用在刀刃上”^[4],精准投向能够创造差异化优势,并能与区域创新链、产业链形成协同的领域。通过开放合作推动技术赋能,以制度创新降低区域协同成本,在存量资源中激发新的增长潜能,实现从本地投入驱动向内外创新与效率协同驱动的根本转变。

第三,福祉增进是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归宿。这是“精明收缩”的人本导向,也是区别于被动衰退的根本标志。高质量发展要求将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收缩过程中,确保在总人口减少、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人均公共资源、收入水平与公共服务质量实现稳步提升。发展的目标从服务于抽象的经济指标回归到服务于“人”本身,尤其是那些扎根于本地的居民。他们的生活品质、社会的公平包容、环境的宜居友好,以及通过区域公共服务共享获得的实际便利,共同构成了衡量发展质量的最终标准。福祉增进内在地要求发展过程在本地改善与区域协同中取得平衡,使居民在享受本地宜居环境的同时,也能共享区域发展成果。

(三) 内生动力系统的四维框架

内生动力系统的构建是收缩型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机制。基于对“精明收缩”与内生发展理论的融合理解,构建包含人力资本、制度资本、产业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四维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强调内部要素的协同,也内在要求各资本维度在区域开放系统中实现动态调适与外部链接。

在四维框架中,人力资本是最具能动性的核心要素,积累来源于本地培育,也受益于区域人才流动与协同共享,为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制度资本通过塑造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影响内部要素配置,推动区域政策协同与治理衔接,为内外资源整合提供制度保障。产业资本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载体,在本地特色培育基础上,积极嵌入区域产业链与创新网络,实现功能互补与韧性提升。社会资本作为系统的“黏合剂”^[5],通过信任机制、合作规范和社会网络,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增强集体行动能力,为内外协同提供社会基础。

这四大资本要素之间相辅相成、互相渗透,并在与外部系统的交互中持续演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区域人才合作机制可进一步激活本地人力资本效能。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产业转型与社会整合,跨区域协同治理增强本地制度的适应性与执行力。产业优化吸引人才集聚、支撑社会治理,区域链接能力也影响社会资本的广度与深度。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影响制度执行与产业合作氛围,外部社会网络的接人为本地社会资本注入新的活力。

从系统动态视角看,四维框架呈现出层级性、协同性与开放性的复合特征。人力资本与制度资本构成系统的基础层,决定了区域在更大系统中的地位与链接能力;产业资本与社会资本构成发展层,表现既受基础层支撑,也通过外部协同反馈于基础层的巩固与更新。当四大要素在内部协同与外部链接中协调发展时,系统可实现内聚外联的良性循环,推动区域走向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反之,若任一维度封闭滞后,可能制约整体系统效能,甚至加剧区域边缘化风险。

二、收缩型区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培育的核心挑战

(一) 人力资本的结构性价散与创新动能断层

收缩型区域在人力资本领域面临的困境,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首先是数量规模的持续性衰减,表现为青壮年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持续外流,导致区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劳动力储

备萎缩;其次是质量层级的断崖式下滑,随着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区域人力资本的平均素质与创新能力呈现下降趋势;最后是专业结构的失衡性配置,人才外流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特征,关键技术领域和创新型人才流失最为严重,导致区域人才生态失衡,且在区域人才分工体系中趋于边缘化。这种多层次的结构性耗散,使得收缩型区域在人才要素的积累上陷入量质齐跌与内外失联的局面。

人力资本的结构性耗散引发了区域创新动能的断层。创新本质上是一个需要各类创新主体密切互动、知识要素在开放网络中充分流动的生态系统。当高素质人才持续流失,首先冲击的是本地创新网络的节点完整性,即企业研发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因核心骨干流失而功能弱化,创新活动的组织基础遭到破坏,削弱了本地创新体系与区域创新网络之间的有效连接,导致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内外循环受阻。随之是知识传承的断裂,体现为本地代际传递的中断,也表现为无法有效承接和消化区域知识溢出,区域内隐性的技术诀窍和管理经验难以系统化积累与更新。同时创新文化亦日渐式微,人才外流带走技术,也带走敢于创新、包容失败的企业家精神与协作意识,导致区域创新氛围稀薄,创新土壤趋于“板结”,进一步降低了在区域创新协作中的参与能力与吸引力。

这一困境的形成机制根植于人才流动的“推拉效应”^[6],从推力因素看,收缩型区域通常面临产业机会稀缺、薪酬水平滞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等制约,形成人才外流的强大推力。从拉力因素看,发达地区完善的创新基础设施、丰富的职业机会、优质的生活环境以及成熟的区域协作网络构成了强劲的拉力。这种流动具有选择性和累积性,在区域层面形成“中心与边缘”式的虹吸格局,使收缩型区域在人才竞争中持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通过区域协同机制实现人才的柔性引进或双向流动,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

(二) 产业体系的刚性锁定与生态脆弱性

收缩型区域的产业体系普遍面临着深刻的“刚性锁定”效应。这种锁定不是简单的产业结构单一,而是由技术路径、制度环境与市场结构相互交织形成的。以枣庄市为例,这座曾以煤炭

工业为荣的城市,在资源枯竭后陷入了典型的“资源诅咒”^[7]:产业体系长期围绕煤炭开采、洗选及初级加工展开,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固定资产、技术人才和制度安排。这种专业化在产业发展初期带来了效率优势,却也埋下了刚性锁定的隐患,专用性资产难以转作他用,技能单一的劳动力无法适应新产业需求,既得利益群体更是成为转型的阻力,区域产业分工中的边缘化地位进一步固化发展路径。

刚性锁定的背后,是路径依赖机制与区域制约的共同作用。一方面,资产专用性构成物质层面的锁定,如煤矿设施、专用铁路等沉没成本使产业转型面临高昂退出壁垒。另一方面,制度刚性来自本地政策体系,也源于区域层面产业协同与功能分工机制的缺失,导致传统产业政策、财税安排与治理结构难以突破,形成多层次、跨尺度的制度固化。枣庄市在资源枯竭后,产业用地配置与基础设施布局仍延续原有惯性,本地调整滞后,且未有效对接区域新兴产业网络,反映出锁定效应的系统性与空间延展性^[8]。

刚性锁定的产业体系必然伴随着严重的生态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同时体现在本地产业网络与区域产业联结两个层面。首先表现为产业链的断裂与区域联动失能:在枣庄市案例中,煤炭资源枯竭导致上游开采业萎缩,中下游产业随之衰退,本地产业链出现系统性断裂;同时在区域产业链中的配套地位也逐渐丧失,未能融入新兴区域产业循环,加剧产业生态的孤立与失衡。其次是企业网络的稀疏化与外部链接弱化:健康的产业生态依赖大中小企业协同与跨产业互动,而在收缩型区域,随着主导产业衰退,配套企业倒闭外迁,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本地创新联系中断;企业缺乏与区域创新链、价值链的有效对接,导致技术溢出受阻、市场协同困难,产业生态呈现碎片化与封闭化并存。

这种产业困境也深刻影响着区域的社会结构和空间形态,并与区域发展格局相互交织。产业体系的刚性锁定往往伴随社会结构固化与区域流动边缘化,产业生态的脆弱性加剧人口外流和空间衰败,进一步削弱在区域城乡体系中的节点功能。产业转型不只是本地经济问题,更是在区域协同背景下重新定位发展角色、重构内外产业联系的系统挑战。

(三) 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困境与协同失灵

收缩型区域面临的治理挑战,本质上是传统增长导向的治理体系与人口经济收缩现实之间的矛盾,也反映出在区域治理协同中的弱势。第一,治理理念的滞后性。在长期的城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增长主义”思维定式,使地方政府习惯以扩张性手段解决发展问题,面对持续性的人口流失和经济收缩往往陷入“规模情结”,难以真正接受收缩的现实并作出战略性调整,也缺乏推动跨区域协同、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格局的制度自觉。这种理念滞后导致了政策工具的失灵,现有的规划体系、财政制度、土地政策和绩效考核机制,大多是建立在增长预期基础上的。当面对收缩现实时,难以有效应对本地问题,更无法适应区域协同治理的要求。基于人口增长预测的基础设施建设会造成资源浪费,以经济总量和增速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既难以激励地方政府推进“减量发展”,也不支持其开展跨区域功能协作与资源共享。

第二,治理结构的碎片化。碎片化体现在本地政府部门之间,也表现在跨层级、跨区域的治理脱节。传统科层制下的部门壁垒导致产业转型、空间规划与社会保障等政策领域各自为政,形成决策孤岛;在区域层面,收缩型区域缺乏有效的机制参与更高层级的规划协调与政策对接,导致发展需求难以被纳入区域战略,在基础设施共建、生态共治、产业联动等方面处于被动地位。部门间与区域间的双重碎片化,在应对收缩这一挑战时,难以形成政策合力,造成有限资源的内耗与错配。

第三,多元主体参与的缺失。收缩治理需要政府内部的协同,也需要企业、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9],同时还应有跨区域企业、社会组织、智库等外部主体的知识与资源导入。在实践中,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仍占主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制度化渠道来吸纳本地与区域相关主体的智慧与力量。这种相对封闭的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收缩带来的复杂挑战,也削弱了政策在本地与社会层面的认同度、在区域层面的协调性,制约治理效能的内外联动。

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困境与协同失灵,使得收缩型区域在应对发展挑战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在区域治理格局中逐渐边缘化。即使识别了正确

的发展方向,现有治理体系也难以提供有效的实施路径与区域协作支持。这种治理能力的不足,直接影响当下的政策效果,削弱区域应对长期挑战、融入区域循环的制度基础。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政策层面的本地调适,更需构建起与收缩现实相适应、兼具内部协同与区域联动能力的新型治理范式。

(四) 社会网络的关系稀疏与集体行动困境

社会资本作为维系区域发展的黏合剂,在收缩型区域面临着持续流失的严峻挑战。这种流失实际上是社会网络结构的解体、社区凝聚力的弱化以及对外社会联结的衰减。随着青壮年人口持续外流,原有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网络出现断裂,社区内部人际交往的频率与深度显著降低,导致社会资本存量急剧下降。同时社区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也渐趋疏离,限制社会资源的输入与交换能力。这种内外交织的关系稀疏化现象,使社区逐渐丧失社会支持功能,居民间信任基础弱化,互惠规范难以维系。

社会记忆失去传承加剧这一危机。年轻一代大量外迁,社会文化网络逐渐衰败,长者拥有的地方性知识、传统技艺与集体记忆难以被晚辈传承,造成代际纽带断裂,削弱文化认同,也使社区在应对挑战时缺乏历史智慧与文化资源的支撑。共同文化记忆是促进社区认同的宝贵财富,随着社区文化联结弱化,缺乏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社区就难以产生共同认同。当社区面临公共事务需协调解决时,往往无法就共同议题形成共识与行动合力。社会文化网络的衰败与集体行动的文化困境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社会文化流失削弱集体行动能力,集体行动失败又进一步侵蚀社会文化网络结构。在此循环中,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持续弱化,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不断降低,社区逐渐陷入内生活力衰竭与外部联结脱节的双重封闭状态。

社会网络问题与经济、治理等领域的问题密切相关,并在区域系统中呈现叠加与扩散效应。经济衰退加剧人口外流和社会网络解体,治理失效削弱社区自我组织的能力与区域协作能力。在收缩型区域,跨领域的负面影响是相互交织的。经济衰退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引发人口外流^[10];人口外流破坏社会网络,削弱集体行动能力;集

体行动困境使社区难以通过自我组织应对经济挑战,也限制借助外部社会资源与区域协同网络缓解困境的可能,在区域发展格局中进一步边缘化。

三、收缩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的激活机制

(一) 精准滴灌、环境留人与区域协同的人才 振兴机制

在收缩型区域的发展困境中,人才流失往往最具破坏性,根源超越区域内部,与区域关系网络失衡密切相关。核心在于突破封闭式内生激励的传统思路,在系统观念下推动人才政策从粗放走向精细,从单点激励转向生态系统营造,注重在开放与交融中激活区域内生活力。

精准滴灌机制要彻底改变传统“撒胡椒面”式的人才引进模式^[11],在区域协同发展的视野下进行精准识别与布局。首先,基于本地的产业定位与在区域产业链中的分工,绘制动态的区域人才需求图谱。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时,除引进技术改造人才外,依托周边中心城市的高校、科研院所,以“柔性引进”“项目合作”等方式吸纳智力资源;发展特色农业的区域,结合城乡融合与电商网络体系,引入跨领域的农业技术、物流与营销人才。其次,建立分层分类且具有区域开放性的人才支持体系。针对高层次人才,可搭建跨区域的科研协作平台;针对技能型人才,推动职业资格互认与跨区培训体系整合;针对青年创业人才,融入更广泛的区域创新孵化网络^[12],在开放中提升政策的实效性 with 吸引力。

环境留人机制着眼于构建能够留住并滋养人才的开放型生态系统。物质环境改善是基础,包括提升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区域可达性,打造宜居宜业且与周边环境相联结的生活空间。社会文化层面,着力营造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包容性氛围,同时积极构建区域联动的人才社群网络,通过跨区域的产业联盟、专业协会等平台,促进人才在更广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缓解收缩型区域易出现的“学术孤独”与“职业天花板”问题。区域协同是环境构建的关键维度,通过基础设施互联、公共服务共享、市场体系互通,

使人才虽身处局部,却能融入整体区域的发展中。

精准滴灌、环境留人与区域协同三者构成相互增强的循环系统。精准引进的人才区域协同的重要纽带,发挥作用需依托本地与区域共同营造的优良环境;环境的持续优化又依赖于本地与外来人才的共同参与及区域间的政策协作。这种内外联动、系统反馈的机制,能够促使人才引进带动环境提升与区域连接,区域协同又反过来增强本地环境的吸引力与人才的扎根意愿。通过精准引进、精心培育与区域交融,逐步形成与本地特色产业相适应、与区域发展相衔接的人才梯队,为收缩型区域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振兴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二) 特色培育、生态重构与区域联动的产业 韧性机制

构建产业韧性是收缩型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要从根本上超越传统“大而全”的封闭式发展思维,转向“专而精、联而活”的开放式发展路径。产业韧性机制的建设,需从特色产业培育、本土产业生态重构以及区域产业联动三个维度协同推进,形成一个内外衔接、动态适应的有机系统。

特色产业培育重在基于区域比较优势进行精准定位。收缩型区域需摆脱对传统产业的路径依赖,在更广阔的区域格局中审视自身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与区位优势,寻找既能体现特色、又能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产业方向。传统资源型城市可围绕矿业遗产,与周边旅游板块联动发展工业旅游网络;农业地区可依托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精品农业与跨区合作的深加工体系。特色产业的选择应遵循“区域分工、错位发展”原则,集中资源打造具有节点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避免同质化与封闭式循环。

产业生态重构着眼于构建开放、多元、富有弹性的产业组织网络。健康的产业生态既依赖内部企业间的共生发展,更需积极嵌入外部创新链与供应链。应着力培育本土中小企业和创新主体,同时积极引入区域龙头企业分支机构或搭建产业协作平台,形成“本地深耕、区域互联”的企业梯队。在空间与功能组织上,应推动产业园区与城市社区融合,并注重建设跨区域的物流、信息与服务共享设施,促进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

在区域内的双向流动。

区域联动是贯穿特色培育与生态重构的关键脉络。特色产业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否在区域市场与价值链中找到可持续的位置,产业生态的韧性取决于与外部网络连接的广度与深度。通过共建区域产业链、共拓统一大市场、共享科技创新平台,收缩型区域能够将外部资源与动能转化为自身结构调整的动力。

特色培育、生态重构与区域联动三者构成紧密的辩证统一体。特色产业为生态重构与区域联动提供内容支点,良好的本土生态是承接区域联动与孵化特色产业的基础,区域联动为特色培育和生态优化注入外部资源与市场空间。通过三者的系统整合,收缩型区域能够逐步构建起根植本土、链接区域的韧性经济体系,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保持适应能力、转换能力与持续创新能力。

(三) 主动适应、多元共治与区域协同的治理调适机制

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是激活收缩型区域内生动力的关键所在,构建以主动适应、多元共治与区域协作为核心的新型治理机制,在开放与联动中提升治理效能。

主动适应型治理要求政府从根本上转变发展理念,从被动抵制收缩转向积极应对、科学利用收缩。建立具有区域关联视角的动态监测预警系统,统筹本区域人口、产业与空间数据,纳入周边区域经济社会流动信息,精准研判区域互动中的发展趋势与自身定位。规划编制应从刚性转向弹性、从封闭转向协同,为区域不确定的发展前景预留空间,主动对接区域发展战略,在基础设施、生态保护、产业布局等方面推动跨行政区衔接。政策执行层面应建立灵活的响应与区域协调机制,确保治理举措既能立足本地实际,也能与周边政策环境相兼容。

多元共治机制的核心在于构建跨界别、跨层级的协同治理网络。在收缩型区域,治理能力建设必须超越单一政府主体,整合本地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以及区域性的企业联盟、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多方力量。建立制度化的区域协商与公众参与平台,在旧城更新、产业转型、环境协同治理等重大决策中,纳入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同时,积极培育和引入能够链接区域资源的社会

组织,使其在公共服务、社区营造等领域发挥枢纽作用,弥补本地治理资源不足^[13]。

区域协作是提升治理适应性与有效性的关键维度。主动适应需建立在区域信息共享与政策协调基础上,多元共治的范畴也应拓展至区域治理伙伴。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区域府际联席会议、专项事务协调委员会等机制,可在数据共享、规划对接、危机协同应对、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形成制度化合作,将外部治理资源与经验有序导入本地治理体系。

主动适应、多元共治与区域协作三者相互依存、彼此强化。主动适应为多元共治与区域协作提供方向与框架,多元共治为主动适应与区域协作提供社会基础与行动合力,区域协作为主动适应与多元共治拓展资源与空间。在实践中,应平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区域联动的关系,构建以本地治理为主体并积极加强区域协同的开放型治理格局。通过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调适,收缩型区域能够突破行政边界的束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整合资源、凝聚共识、协同行动,构建更具韧性、回应性与包容性的治理体系,为区域整体振兴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四) 社区认同、社会资本与网络开放的网络再造机制

在收缩型区域的发展进程中,社会网络的重构尤为关键。推进区域转型与社区可持续发展需要超越仅聚焦内部凝聚的封闭思路,通过有意识地修复与培育社会资本,重塑兼具内聚力与开放性的社区网络,使居民从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区域联结者,为整体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在人口持续流失与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传统的社区认同不断受到冲击,亟需构建一种植根本地、面向区域的新型认同模式。要求在深入挖掘与保护地方文化遗产的同时,主动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区域文化脉络中进行诠释与连接,例如通过联合申遗、共同举办文化节庆等方式,增强居民的地域自豪感与区域归属感^[14]。社区公共空间的更新改造,应注重功能复合与开放性,将闲置空间转化为兼具本地服务与区域接待能力的共享场所,如社区文化驿站、区域研学基地等,成为促进内外交流的节点。居民参与机制的建设同样

需要开放视野,在社区议事会等平台中,酌情引入外部专家、返乡精英或相邻社区代表,以拓宽视野、链接资源。

社会资本的修复是网络再造的治本之策,核心在于构建内外联通的信任与合作网络。在培育内部社会资本方面,可通过时间银行、社区基金等制度化平台,强化居民间的互助互信。同时着力构建外向型社会资本,主动搭建与外部企业、高校、社会组织、周边社区之间的常态化交流合作渠道。同时,建立“社区与高校”结对机制、发展跨区域社区伙伴关系,组织面向区域的技能培训或产业交流活动,将外部资源、信息与机会引入社区,打破社会网络的封闭性。

网络开放是推动社区认同与社会资本实现动态升级的关键。社区认同需要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得到明确和强化;社会资本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网络所能连接的外部资源的质量与多样性,健全的社会网络应兼具强内部联结与弱外部桥梁,既能维持共同体稳定,又能保持创新与增长的通道。

社区的发展活力,根植于内在的认同感、社会资本与对外的网络开放三者之间的持续互动。社区内生的认同与信任构成其主动向外开放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开放的交往不断引入新的资源与观念,反过来滋养并更新社区认同,使社会资本的内涵得以丰富和深化。推动这一进程,应采取渐进路径,从具体、可操作的内外联动项目开始,逐步培育制度化的开放合作习惯。当社区既能保持内部团结,又能积极维系外部联通时,便自然展现出更强的韧性、适应性与资源整合能力,进而有效支撑产业转型、人才流动等区域协同战略,最终促成社会基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四、结语

本研究基于“精明收缩”与内生发展理论,构建立足本地、面向区域的收缩型区域高质量发展动力框架。框架以人力、制度、产业与社会四类资本的内部协同与外部链接为核心,破解要素流失、产业僵化、治理失活与社会松散等困境,形成“战略收缩、内生赋能与区域联动”相结合的发展新逻辑。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这一重大论断,呼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全面提升发展质量效益”的战略导向。阐明收缩型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本质是从封闭的“规模扩张”转向开放的“效能提升”与“民生改善”,过程在于内部要素的优化重组,在区域协同中重新定位价值、交换资源、承接功能。面向未来,收缩型区域的振兴必须摒弃孤立的内生视角。只有坚持立足本地特色、激活内生潜力、深化区域协同,在开放系统中重新配置和整合发展要素,才能推动从“被动收缩”转向“主动转型、精明再生、融合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同类区域提供实践参照,也为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扎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系统化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 2025-10-29(001).
- [2] POPPER D E, POPPER F J. Small can be beautiful: Coming to terms with decline[J]. Planning, 2002, 68(7): 20-23.
- [3] 陈姜全, 李效顺, 刘希朝, 等. 基于“三生空间”转型的碳收支演变机制与碳补偿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5, 34(3): 610-626.
- [4] 何忠乐, 戴焰军.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战略优势与路径优化[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4(6): 39-46.
- [5] 郭建斌. 社会资本对降碳减污协同治理的调节作用与机制改进研究——基于重点城市群开展碳排放权和排污权交易视角[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5(4): 36-47.
- [6] 胡晓宇, 陈刚, 王光辉. 基于履历数据的“杰青”人才流动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43(9): 1771-1784.
- [7] 吴健贤. 审出“青山”照眼明: 中国环境司法的碳减排效果评估[J]. 经济学报, 2025(11): 1-16.
- [8] 王文棋, 刘兆德, 刘聪, 等. 资源枯竭城市空间演化特征及精明收缩策略——以枣庄市为例[J]. 资源科学, 2024, 46(6): 1131-1143.
- [9] 马雪松, 杨欣雨. 收缩型城市治理: 政治逻辑、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J]. 治理研究, 2025, 41(2): 4-19.
- [10] 罗小龙, 孙庆颖, 唐蜜, 等. 大都市跨界新城的“空心化”困境及对策: 沪苏浙皖边界地区的实证[J]. 城市

- 规划学刊, 2025(4): 33 – 40.
- [11] 陈炼, 段德罡, 东云龙. 精明收缩视域下的乡村产业: 困境解析、逻辑内涵与治理路径 [J]. [现代城市研究](#), 2024(5): 1 – 7.
- [12] 田雪姣, 杨武, 雷家骕, 等. 区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 [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8): 173 – 177.
- [13] 李诗隽. 资本、空间、阶层与治理: 中国城市老旧社区商业化更新模式研究 [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53(5): 150 – 160.
- [14] 柳建文, 徐铭辰.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群治理与创新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5, 46(1): 48 – 56.
- (责编: 程爱婕)